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

The Re-linkage betwee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oi:10.30390/ISC.201309_52(3).0002

問題與研究, 52(3), 2013

Issues & Studies, 52(3), 2013

作者/Author：廖舜右(Shun-Yo Liao);蔡松伯(Sung-Po Tsai)

頁數/Page：43-6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9_52\(3\).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9_52(3).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

廖 舜 右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蔡 松 伯

(中興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 要

本文主張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宜再度檢視國內層次的眾多因素與變項，而應從實然的角度來思考國家如何評估威脅、國家如何選擇外交政策的類型。本文說明新古典現實主義並非為解決異例(anomaly)誕生，而是將非體系與理念因素納入體系理論的邏輯之中，也就是將國內層次因素解讀為決策者對壓力的反應類型，亦即決策者會評估並判斷應採取何種類型之外交政策。而根據決策者對國際壓力的知覺(perception)，以及對於國內政治的評估(calculation)，本文整理出國家具有制衡、扈從、避險，以及適應等四種外交政策類型。基於類型而非特定內容的研究方式，可使新古典現實主義無需面對複雜無序的國內因素，並專注於介於體系與單位之間的非結構與理念因素，進而避免陷入理論發展的退化過程。

關鍵詞：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類型、決策者評估、進步的研究途徑、中介變項

* * *

壹、前 言

國際關係學門中的現實主義研究綱領，經過學者華茲(Kenneth N. Waltz)的詮釋後，已確立體系理論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國際體系被認為是影響國家行為的主要自變項，而國家間的互動最終將形塑出無政府狀態下權力均衡的常態。因此，體系理論可以詮釋國際政治之結果，也能預測長期的發展國際趨勢。然而，冷戰的結束以及國際關係中的跨領域議題崛起，使體系理論面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即為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一國對外安全政策的變化，以致於無法預測美俄兩極體系之崩

解。由於現實主義傳統上將追求國家安全視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亦是維繫一國生存的關鍵，因此本文在之後的論述，將對外安全政策放大為外交政策，希冀讀者能理解。

華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應有其自主領域 (autonomous realms)，例如國際結構就是一個簡潔有力的自變項，同時外交政策受太多因素影響，因而無法理論化。^①事實上，體系理論確切說明一般外交政策，就是權力平衡，亦即國家無論是主動的作為還是被動的接受，都會達成接近均勢的國際體系。然而近年研究發現，國家在執行權力平衡政策時常出現制衡不足 (underbalancing) 的現象，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國家對於體系的認知，導致外交政策創造出不同於權力平衡的結果。^②因此體系理論並非無法解釋外交政策，而是需要評估國內政治的因素，這就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緣起脈絡。

學者羅斯 (Gideon Rose) 認為國際權力位階的相對分布與國家外交政策之間，缺乏連接兩者的完美傳送帶 (transmission belt)：國家事實上並非理性且單一的行為者，其對外行為取決國內政治對國際結構的反應，其中包括領導菁英對於相對權力是否取得共識，以及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強弱。^③如果將國際結構視為自變項，一國的外交政策視為應變項，則國內政治應扮演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 的角色。簡而言之，結構限制或鼓勵國家採取哪些選項，但真正做出抉擇的是國家內部的決策核心。在不違反核心假設的前提下，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理論上不若結構現實主義簡潔，但在描述力上仍有發展討論的空間。

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也受到學界諸多的批評，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類。首先，將分析層次從體系走向國家是在大開理論倒車，也就是回到華茲所謂的簡約理論研究途徑；即以單一國家的外交政策作為建構國際政治理論的基礎。^④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僅僅注重特定國家與體系互動的結果，因此只能詳細描述國家在某段歷史期間的作為，無法建立一個在廣度上普遍有效的理論。最後，新古典現實主義缺乏一個統一的研究途徑，不同的研究者可隨意加入不同的中介變項，如國家認同、文化傾向、領導者的評估、國內政治因素等，導致理論發展受到質疑。^⑤

因此本文試圖解決上述三大問題，藉由整理現有文獻與概念上的推演，希冀能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架構，並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改進。首先，該架構將強化體系因素的重要性，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常將體系因素視為環境限制而將其固定變項，以利於中介變項 (國內政治) 的研究，但也造成見樹不見林之憾，缺乏對體系因素的

註①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4-55.

註②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62-164.

註③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6-147.

註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79), p. 64.

註⑤ Jeffery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15-55.

理解。其次，在補充結構現實主義的不足時，也應仿效其建立普遍性的理論框架。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常藉由歷史個案分析，闡述決策者如何在國際局勢與國內壓力下作出外交政策，但其論述卻經常著重於描述而缺乏解釋，更遑論歸納政策類型。

因此，國內學者鄭端耀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混合式」的理論主張，雖然跨越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鴻溝，但卻減低了該理論的特殊性與純淨性，應繼續發展務實的中程理論架構。^⑥為使研究架構更為務實與清晰，本文提出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中介變項為國內政治，並經由檢視文獻後發現，國內政治應解讀為決策者對國內壓力的反應類型，亦即決策者會評估並判斷應採取何種類型之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運用此一因素並非為了全面解釋複雜的國內政治結構，而是在體系層次與國內層次間，設定適切的連結。

最後，本文仍然將體系因素視為主要的自變項，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分配的結構才是國家判斷外部威脅的主要來源，其回應威脅的方式就是以對外政策追求安全，因此外交政策為本文的應變項。然而，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國內政治因素往往左右外交政策的形成，故本文以決策者評估整合各種中介變項，當一國面對外部威脅時，決策者需要計算國內是否有能力因應形勢變遷。因此，本文有必要先介紹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再進行中介變項之整合。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批判與發展

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理論核心承繼新現實主義對於體系與結構的假設與推論，但在拓寬解釋變項範圍的部分上，則重新檢視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的使用。因此新古典的學者們必須針對上述兩者的研究成果與理論邏輯，從中理解現實主義如何在保有體系因素的情況下，納入其他非體系（如國內政治因素）與非物質（如決策者的理念等）變項。故以下將從對現實主義發展趨勢的批評，延伸至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修正與研究。

學者萊格羅（Jeffery Legro）與莫拉維茲克（Andrew Moravcsik）認為，現實主義學者們開始使用非體系的因素進行研究，已逐漸遠離新現實主義的典範，當學者們開始使用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與理念因素（ideas）進行研究時，其實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自由主義，制度主義或知識論理論（epistemic theory）的研究範疇。^⑦同時他們也重申，不同理論的分別應該在他們研究所採取的變項與位置（location），如果現實主義使用其他理論所採取的變項，並非是一種研究的進展，而是理論的退化。^⑧該文結論表明，現實主義應該嚴守邏輯的一致性，回到權力分布與物質權力的研究根

註⑥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34~135。

註⑦ Jeffery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10~12.

註⑧ *Ibid.*, pp. 50~52.

基。

然而，學者拉斯本（Brian Rathbun）卻認為，所有國際關係理論都涉及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的討論，華茲雖然闡明無政府體系使國家有誘因去累積權力，但卻缺乏說明權力的內涵為何；因此新古典以前的現實主義學者，皆在試圖修正權力的內涵與應用，如我們所知的威脅平衡或攻守平衡理論；而新古典則接續前述的研究成果，採取非體系的因素以解釋權力是如何被強化或被減損；整體來看，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是一種持續問題化（problematize）權力內涵的過程，而非任意採納其他理論的變項。^⑨

因此拉斯本強調，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們因為將體系理論視為其研究背景，因而比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更加科學化，然而他也指出新古典目前面臨的三大困難，分別是如何凸顯體系的限制、如何證明背離體系的後果、以及國內利益如何透過傳送帶去影響政府決策。^⑩事實上，華茲可能也不認為國際結構擁有著獨斷的影響力，前文已述及他將國際體系比喻為經濟學中的市場因素，即使國際體系對國家造成限制並推動其行為，但國家仍有意願與能力選擇其他行為，甚至選擇滅亡。^⑪因此不該將體系理論看作應然面、規範性的理論，而應從實然的角度來思考為何國家無法客觀評估威脅、為何國家會選擇背離體系。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只為解決異例（anomaly）而誕生，而是將非體系與理念因素納入體系理論的邏輯之中，使理論繼續與現實的外交政策接軌。

而在理論是否產生退化方面，本文參考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對於科學研究中研究綱領相互競爭的概念，如果將國際關係中的各理論視為競爭的狀態，則不同理論皆會強化自己的「防護帶」假設以保護理論內核。而修正「防護帶」假設的理論可被視為進步，內核受到其他理論影響而改變基本假設的理論發展，則被視為是退化的。萊格羅與莫拉維茲克對於有關現實主義學者採取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做為變項就是退化的立場，就是基於他們認為這已經違反現實主義的內核。然而本文認為這並非退化，而是重新汲取古典現實主義的精華，形同強化了現實主義的防護帶假設。^⑫

而在探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與其他理論的差異上，有兩篇研究值得深入討論。首先是扎卡利亞對於史耐德（Jack Snyder）的批評，他認為現實主義者研究國內政治因素並非不對，但必須要加入國際體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否則就會形成簡約主義（reductionism），誤以特定國家的內政問題來判斷國際結果，因此未來的現實主義研究應從結構出發，並藉由國內政治強化解釋力。^⑬

學者史特林佛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則從比較理論途徑，正面肯定新現實主義比新自由主義更能結合國內因素，因為後者本應以國內過程為自變項，但在國際合

註⑨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 300-302.

註⑩ *Ibid.*, p. 307, pp. 320-321.

註⑪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79), pp. 76-77.

註⑫ 廖舜右，「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31-48。

註⑬ See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作的研究上，國際過程的參與者反而成爲真正的自變項，並假定合作才是唯一有效率的目標，因而忽略國內固有的複雜利益；但新現實主義則將國內過程視爲達成國際結果的方法，因此在方法論上，無政府環境與國內政治，皆可作爲同時並存的自變項。^⑭因此，當新古典現實主義仍然從體系理論的角度進行研究時，不應被視爲退化，反而在解釋力上得到長足的提升。

另一方面，回溯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亦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特色之一，也間接證明此理論的邏輯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循序漸進。若從學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國家間的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觀察，他認爲國際政治受到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⑮學者基欽（Nicholas Kitchen）根據其對於該書的研究，發現古典現實主義中，國家對於國際環境的態度，不只受權力分布所促使，也受理念的影響，其中包括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主觀評估；此外，由於所有的政治都是權力政治，政治家（statesman）必須從對權力分布的判斷中，發現與實行國家利益。^⑯如果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非體系因素的運用中，是承繼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那在國內政治與理念的運用方面上，也必然受限於對物質權力的衡量（assessment）上。這亦是此理論不同於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⑰之處。

根據上述的思維路徑，目前已有部分學者從決策者評估的角度，開始進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學者羅貝爾（Steven E. Lobell）、李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與塔理亞菲羅共同編輯的專書《新古典現實主義，國家與外交政策》（*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表明主要處理三個議題，首先是國家如何在無政府的體系中衡量威脅，其二探討誰是相關的國內行爲者，最後當國內領袖或團體對外國威脅有不一致的意見時，會發生何種情況。^⑱在該書的研究中，體系因素爲主要的自變項，外交政策是研究中的應變項，國內限制與決策者的評估則爲其

註⑭ See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25.

註⑮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p. 4.

註⑯ Nicholas Kitchen,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0), pp. 126-127.

註⑰ 建構主義的確存在許多派別，但 Legro & Moravcsik 並沒有在文章中確切說明是何種派別在建構主義。因此本文認爲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知識論上並非詮釋性（interpretive）或後現代的理論，仍是以理性爲基礎的實證理論，其理念因素可視爲對物質因素的評估。因此若要與建構主義比較，其對象應是 Wendt 所提出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及 Checkel 所提出的現代建構主義等，這些學者皆嘗試在後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之間建立橋樑，亦不排斥實證的知識論，並將理念視爲主要的變項。關於建構主義的派別分類，可參閱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63-87。

註⑱ Steven E. Lobell, "Threat Assessment,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5-46.

間的中介變項，而他們的主要研究目標，乃解釋為何相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國際環境中，或不同的國家在相同的國際環境中，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⑩

參、新古典現實主義之途徑

本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研究外交政策類型的主要途徑，但並非針對特定政策研究，因而可更接近理論的闡明與研究。學者鄭端耀已在其研究中，整理主要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與特色。^⑪故本文在此基礎下，發現有以下幾種途徑可以被視為是結合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此外，這些研究模式各有其優越之處，但本文將根據主題的需要，選擇最適的研究途徑。

一、外交史研究

外交史研究的特徵在於引據史書，重新詮釋歷史事件，甚至試圖藉由結合理論，形塑重新詮釋歷史的可能性。其優點是學者經常可以尋獲應證理論的案例，只要例證足夠，論述清晰，其他學者反駁的可能性相當低，且有助於理論的實用。學者扎卡利亞 (Fareed Zakaria) 在其著作從財富到權力：美國世界地位的獨特起源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中研究美國早期的外交政策，其結論認為美國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物質力量日趨強大，也具有對外擴張的野心，但由於政府本身過於虛弱，擴張程度相當有限，直到二戰以後才真正崛起。^⑫扎卡利亞從中發現，決策者必須藉由官僚體系來將權力轉化為政府的能力，因此外交政策的產出並不只受到體系影響，政府能力是更直接的因素。此種以外交史研究為基礎，間接建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事實上也是最為常見的途徑。但由於不同情勢下所觀察到的事物皆有所不同，除非進行跨時代與跨區域的比較，否則難以建立一個普遍的理論。

二、比較理論研究

比較理論研究藉由區分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的不同之處，來達到確立理論「座標」的功效。例如史特林佛克藉由比較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者對於國內政治因素的整合過程，發現新自由主義忽略國內政治根深蒂固的影響，但現實主義卻理解到國內過程會影響決策者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外交政策。^⑬扎卡利亞則以回應其他學者

註^⑩ *Ibid.*, pp. 20~21.

註^⑪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 (2005 年 1 月)，頁 115~140。

註^⑫ See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⑬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20~23.

著作的方式，重新探討現實主義中的攻勢、守勢與新古典的之間的異同，最後藉由舉出該著作的缺失，提出一個正確的現實主義理論應從體系因素出發，再輔以國內政治因素以加強解釋力。²³然而，此途徑的最大缺陷在於無法精準地表達「座標」的位置，雖然成功地發現其他理論的不足，但卻無法完整地說明理論的內涵。

三、中介變項論證之途徑

學者羅斯認為，研究外交政策的途徑之一，就是體系因素在形塑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探討國家層次（unit level）這個中介變項的影響。因此，許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學者致力於尋找適當的中介變項，來闡述外交政策如何透過國內層次的運作來回應國際環境帶來的衝擊。相較於外交史研究途徑著重於案例之解釋，中介變項論證之途徑更重視理論邏輯的描述，以及國內行為者間的因果關係。故採取此一途徑的研究者也許在案例研究上較不豐富，但在理論的推演以及模式的建立上，有著較為長足的發揮。另一方面，也較比較理論研究途徑，更易建立中介變項的操作模式。

而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中，學者塔理亞菲羅（Jeffrey W. Taliaferro）在其著作《備戰下的國家建設：新古典現實主義與資源汲取型國家》（*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Extractive State*）中，認為當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會模仿成功國家的經驗，因此需要動員國內資源以追求安全，而動員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決策者藉由操作個人與國家認同間的關係，能夠有效的凝聚社會以達到外交目的。其主要的推論方式，就是藉由國家動員能力與外交政策間的因果關係，企圖結合意識形態、民意等國內政治中的理念因素。

然而，此種途徑最大的限制，在於實證研究的不足。此一途徑往往花費大量篇幅闡述何種中介變項可以綜合其他國內因素，但卻忽略案例應證上的效度，有時予人因題設事之疑。但此途徑的主要貢獻在於釐清中介變項與外交政策間的關係，並嘗試建立模式，以供未來的實證研究所用。因此，本文在採取此途徑時，避免進行不成熟的實例研究過程，將研究內容著重在中介變項之論證，以求建立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間的聯繫。

肆、理念因素與外交政策

本節嘗試闡明如何在承認體系因素優先性的前提下，探討何種中介變項可以綜合其他國內政治因素，並在物質基礎下結合理念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以決策者的知覺與評估，描述外交政策的形式與種類。為兼顧理論的描述力與簡潔性，本文將複雜的理念因素化約為「維持現狀」與「改變現狀」兩種，最後以此建立外交政策的產出模式，希冀能藉由此一途徑，更貼近現實的外交政策。

註²³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 196-198.

一、有限制的使用國內政治因素

在邏輯上，來自國際體系的壓力與國內政治或理念影響，對於決策者來說是同時並存的，因此本文在設定外交範疇時，將兩種變項視為需要同時評估的因素，故而採取雙變量分析（bivariate analysis）以進行論述。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來說，無政府的國際環境是主要但間接的因素，國內政治則是次要但直接的因素。^④國家雖可以認知到體系帶來的生存壓力，但卻可以自由選擇回應的方式，如同華茲將國際體系比喻為市場，而國家就像是市場中的廠商，即使市場的力量會驅動廠商的行為，但廠商仍可選擇如何回應市場競爭。^⑤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之一，即在於討論理念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就是研究決策者對國內外壓力的認知。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認知到國內政治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但僅是有限制地使用，而非將所有因素都視為變項。本文根據決策者的認知，結合其對於國內政治的評估，從中判斷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因此最重要的主題，在於以決策者認知類型結合體系因素與國內因素。

為了有效的將理念因素結合國內政治因素與國際體系因素，新古典現實主義必須限制理念因素的內涵。學者拉斯本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會有限制地使用理念因素，將其視為認知主義（cognitivism）與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範疇而非建構主義，也就是國家內的決策者會客觀評估國際體系以捍衛國家利益，但此利益卻常受國內利益團體的影響，此時理念則僅局限於動員國內群眾以對抗利益團體。^⑥

二、決策者評估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另一方面，新古典學者也嘗試從古典現實主義，尋找理念的運用模式或限制為何。學者基欽亦認為現實主義使用理念的方式亦不同於建構主義，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理念是政治家用來說服與動員民眾的工具，隨著決策者運用此能力的高低，其國家能力與外交政策的品質也會隨之不同。^⑦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理念可以用來輔助決策者衡量國際環境，並以此動員國內資源以捍衛其所認知的國家利益，且不同的理念的確會產生不同的外交政策種類，在權力平衡之外仍有更多選擇。

本文根據上述對理念的認識，將理念定義為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知覺（perception）與對國內政治的評估（calculation），以及對於整體國家利益的衡量（assessment）。然而，不同國際環境與不同的國內政治，決策者認知到的狀況與評估

註④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 22.

註⑤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9-72.

註⑥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pp. 300, 303, 312, 314, 316, 317.

註⑦ Nicholas Kitchen,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pp. 124-125.

後的國家利益都不盡相同。因此有必要將所有的衡量作一概念化的簡約。圖 1 則為本文整理上述內容索導出的理論框架。

圖 1 特別將決策者衡量置於體系壓力與國內壓力之間，用意在於闡明決策者因素能涵蓋其他兩個國內政治因素，但事實上，決策者評估仍屬國內層次的因素，本文希望藉此連接兩個層次對外交政策類型的影響。決策者除了是拍板定案的行為者以外，更重要的是其亦為主要知覺國際環境的行為者。如果決策菁英間能夠產生菁英共識 (elite consensus)，則代表彼此有共享的認知，其中包括對於問題的本質、改革問題的辦法等，都有著合作的共識；然而，如果決策菁英由於國內政治的因素，使回應國際環境的政治成本升高，就可能低度回應，甚至違背體系所帶來的壓力。²⁸因此，不論國內政治因素如何變動，皆是決策者制定外交政策前必須衡量的因素。本文將此一認識整合為決策者的評估，希冀能藉此描繪外交政策分析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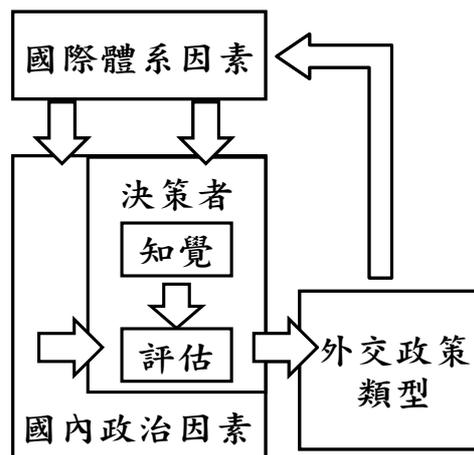


圖 1 新古典現實主義之理論框架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其中，決策者的衡量包括對國際壓力的知覺 (perception)，以及對於國內政治的評估 (calculation)；前者是由決策者對於國際局勢的主動判斷，後者則是面對國內政治壓力的被動評估，而兩者先後影響下，就會產出不同於體系現實主義所假定的均勢外交政策。其中，決策者除評估國內政治結構，也要了解政府能力對外交政策的限制，方能配合其對國際環境的知覺，選擇外交決策的類型與取向。另一方面，外交政策雖是決策者權衡國內政治的結果，但仍需回應體系帶來的限制，不能妥善回應體系的外交政策，將會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故可得出決策者對國際環境的知覺雖優先於國內政治的評估，但決策者評估的結果亦可能違背其對體系的認知，因而選擇不適切

註²⁸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69-170.

的外交政策取向，這亦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其具備解釋失敗外交政策的能力。

三、貼近現實的外交政策

學者羅斯認為，誤判（misperception）是現實外交工作常出現的情況。體系現實主義的理性假設只是方便學者預測領導人的決策，但事實上的外交決策卻是緩慢、破碎且無實際回應體系的政策產出。²⁹因此決策者可能無法掌握相對充足的資訊，且對於國際體系中相對權力的分布，可能只有相當粗略的認知。在這種情形下的外交決策，可能需要仰賴決策者本身的經驗、理念甚至國內民意，來填補體系現實主義假設與決策者之間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差距。

學者基欽認為，決策者對於戰略的評估，不只是國際體系的相對權力分布，也包括他國的意圖與國內的觀點，這些理念因素有助於決策者填補在資訊與知識上的漏洞，選擇各式不同的手段來達到其所認知的國家利益。³⁰因此，理念因素並非深入考據決策者的家世、求學背景與周遭親信，而是根據國際體系的趨勢，與國內政治的情勢，並輔以決策者認知的結果，針對已發生的外交政策，根據因果關係進行分類。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在解釋力上不如體系現實主義，但在描述力上卻明顯增強，因而更接近實際的外交運作過程。

然而，決策者評估雖可作為連接體系層次與國內政治層次的因素，但難以涵蓋複雜的國內政治層次。尤其在於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干涉與制約上，新古典現實主義無法如同國內政治學派或建構主義學派，發展較為詳實的論述框架。例如國內各黨派間的爭執、國會政治對行政機關的制約、政治體系或文化如何影響決策等。僅以決策者評估作為變項，並無法全面解釋國內政治結構。

但筆者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加入中介變項的討論，其目的並非為了接近國內政治學派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是為了更細緻地闡述體系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以及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僵化趨勢。因此，藉由增強描述力，新古典現實主義比體系現實主義更能接近現實的外交政策，也與建構主義具有不同理念因素定位。為此，簡潔化理念因素可有助於新古典理論框架之構成，以下將繼續闡述理念的種類與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伍、外交政策類型之適用

學者羅斯提出，冷戰時期兩強競爭的不只是權力，而是如何藉由競爭來達到自己應有的國際地位，因此冷戰兩強間並無出現大型戰爭，更常出現的是理念方面的認知

註²⁹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57-158.

註³⁰ Nicholas Kitchen,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pp. 133-134.

對立。^①因此除卻權力因素，理念因素也必須納入理論邏輯的評估。故本文採用學者施韋勒 (Randall L. Schweller) 對於國家理念因素的分類，分別是維持現狀 (status quo) 與改變現狀 (revisionist)，前者傾向接受政治現狀，通常是既得利益者，後者則不滿現有的政治地位，希望藉由改變秩序來提升其利益。

而學者帕瑪 (Glenn Palmer) 與摩根 (T. Clifton Morgan) 則據此量化外交政策，提出兩財貨模型 (two-goods theory)，他們認為外交政策的組合可通則化為兩個目標，分別是維持現狀財 (maintenance) 與改變現狀財 (change)，因此一國外交政策所追求的，就是維護對其有利的維持現狀財，同時追求改變現狀財以改變其不樂見的部分。^②故本文認為，不論是國際體系給予決策者的知覺，或是決策者對於國內政治的評估，皆可簡化為兩種基本意向，也就是改變現狀與維持現狀，而不同意向在國際與國內面向的組合，則可以改變外交政策的類型。故根據上述假設，整理出表 1，表中外交政策類型後的括號為代表學者，同時也繼續闡述不同政策間的差異。

表 1 外交政策的分類

		對國際壓力的知覺	
		維持現狀	改變現狀
對國內政治的評估	維持現狀	制衡 (Steven Walt)	適應 (David Kang)
	改變現狀	避險 (Kuik Cheng Chwee)	扈從 (R. Schweller)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制衡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學者施韋勒認為，結構現實主義者假設國家有維持現狀的先天偏好，因而認為國家面對大國崛起時必然採取制衡 (balancing)，以求維持均勢的現狀，然而亦有國家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良機，故採取扈從 (bandwagoning) 以求跟隨大國獲利。^③因此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跨層次分析，可發現制衡與扈從同時處於光譜上的兩端，當決策者認知到國際上的壓力使其需要採取制衡，而同時國內層次的評估也同意其作法，制衡就會作為有效的外交政策而被執行，扈從的狀況亦為同理。

制衡政策意味該國決策者認知到自身擁有足夠改變現狀的能力與意願，但與結構現實主義所認知的權力平衡不同，此處的制衡政策較接近瓦特 (Steven M. Walt) 所闡

註①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 159.

註② Glenn Palmer and T. Clifton Morgan 著，梁書寧譯，*外交政策理論分析*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2006年)，頁9~11。

註③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06~107.

述的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假設兩大國皆會對其他小國造成一定的威脅，這些小國應與威脅較低的一方結為同盟，以對抗威脅較大的一方。³⁴故威脅的來源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力量，也包括非物質的因素，如一國感受他國在其地緣戰略上的利益以及實際作為。瓦特認為，衡量一國所造成的威脅除了理解該國的侵略能力 (offensive capability)，尚須評估地理鄰近性 (geographic proximity)，以及受威脅國所認知到的意圖 (perceived intention)。³⁵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決策者不僅衡量國內對威脅的評估，也必須知覺國際體系中的誰的威脅更大。

二、扈從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對照於制衡政策，既不具備能力亦無意願的國家，則會採取扈從政策。瓦特認為扈從大國可以緩和彼此的衝突，同時也能在戰爭中享受大國所得的利益。³⁶但學者施韋勒批評瓦特的威脅平衡將制衡與扈從都視為對威脅的反應，因此得出國家較容易採取制衡的結論，但事實上扈從政策背後的意涵不是對威脅的反應，而是利益的增加。³⁷因為制衡的成本極高，除非有足夠的能力與意願，否則採取扈從是更容易獲利的方式。

然而，根據表 1 的假設，扈從政策的出現時機在於決策者衡量國內外壓力後，認為改變現狀是能兼顧國家利益與國內政治的作法，因此該國會扈從崛起中的強國，追隨其改變現有結構下的不平等，並從中獲利。但扈從政策僅適用於小國，並不適用於改變體系的「第二名」強國。因為在邏輯上，崛起國的決策者必定知道改變現狀的利益，但卻缺乏可以扈從的對象，因此崛起國仍須採取權力平衡的政策，與體系中的霸權競爭。學者布贊 (Barry Buzan) 認為，改變現狀國家仍有強弱之分，強國會力求改變體系，挑戰現狀霸權；弱國則會選擇與強國結盟，以求更大的影響力。³⁸因此，表 1 的分類方式並無法解釋第二名的崛起國，這也是該表少數的例外之一。除此之外，表 1 的分類方式可適用於大部分企圖改變現狀的國家。

三、避險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然而，決策者對國際壓力的知覺，可能會受到自國內政治的挑戰，例如決策者所認知的外來威脅，對於國內的產業利益團體來說，卻是重要的貿易夥伴。此時的決策者想要維持現狀，減少崛起國的威脅，但產業利益團體所支持的方向，卻符合崛起國

註 34 威脅平衡的概念可參見 Stev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 35 Stev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5~6.

註 36 Stev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1985), pp. 6~8.

註 37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106~107.

註 38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 1991), pp. 304~305.

改變現狀的意圖。決策者因此需要其他的外交政策來替代制衡，故在本文中提出避險 (hedging)。

國關學界對於避險政策的了解，多半將其置於「制衡—扈從」光譜間的中段。學者康燦雄 (David C. Kang) 就主張扈從是一種中段策略 (middle strategies)，此策略背後的意涵是國家對於潛在敵人的猜疑與恐懼，雖然未達到採取制衡的境地，但此時藉由避險有助於其應付潛在敵人。^㉞馬來西亞籍學者郭清水 (Kuik Cheng Chwee) 認為扈從究其本質是一種雙箭頭途徑 (two-pronged approach)，小國對於改變現狀的大國同時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政策，分別是收益極大化 (return-maximizing) 與偶然性危險 (risk-contingency)，前者採取經濟實務的觀點，希望藉由有限的扈從 (limited-bandwagon) 以及具約束力的交往 (binding-engagement)，從大國身上獲致更多經濟與外交上的資源；而後者則是藉由間接制衡 (indirect-balancing)，盡量減少避險政策在安全議題上帶來的損失。^㉟

綜述以上，避險政策在原則上接近軟性的制衡政策，但因為經濟因素仍需保持穩定的關係。因此是一種同時在經濟與安全目標上雙邊投注的策略，一方面盡量減少在安全議題上的損失，決策者亦不放棄與現狀霸權合作，另一方面則在與改變現狀的大國交往中擴大利益。

四、適應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決策者在某些國際情勢中，亦有可能需要扈從的政策，但國內卻興起反抗的聲浪，此時決策者必須尋找其他的政策以替代理想的扈從政策。本文以適應 (accommodate) 政策來說明此類需求。康燦雄認為較無知覺大國威脅的國家，可能會採取適應大國策略的政策，僅在少數的議題上堅持立場，是一種藉著符合對手利益的方式來降低其對自身的威脅。^㊱

適應政策與避險政策的差別，主要在於原則上仍是傾向採取扈從政策，只是評估到國內政治的需求，在某些議題上無法完全的跟隨改變現狀大國的利益。若運用在實際上，決策者認知到改變現狀方有利於該國，但國內則安於現狀的穩定，此時雖在安全上扈從崛起中的改變現狀大國，但在經濟議題上仍盡量配合現狀霸權國。

若整理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大致歸類外交政策類型源於滿足國內外兩種壓力所做出的妥協，其差別在於各國根據自身對外的評估與內部的情勢，而有不同的外交目標。但共同的本質是每個國家都在致力維持現有優勢，並改善現存困境。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巨型理論，應具有指引並整合中小型理論之功能，而非僅僅是解決體

註 ㉞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5.

註 ㉟ Kuik Cheng Chwee, "The Essential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 171.

註 ㊱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6.

系現實主義中的特殊現象。

五、外交政策類型之區別

總體而言，本文在界定上以光譜概念作為外交政策的分類，其中制衡與扈從兩種政策，可視為光譜的兩端，而避險與適應政策則居於中段。避險政策在原則上接近軟性的制衡政策，但因為經濟因素仍需保持穩定的關係。適應政策則是原則上採取扈從企圖改變現狀的崛起國，但由於民意或經濟的評估，而需要配合現狀霸權的安排。而外交政策的分類，則可根據改變現狀與維持現狀的成分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策光譜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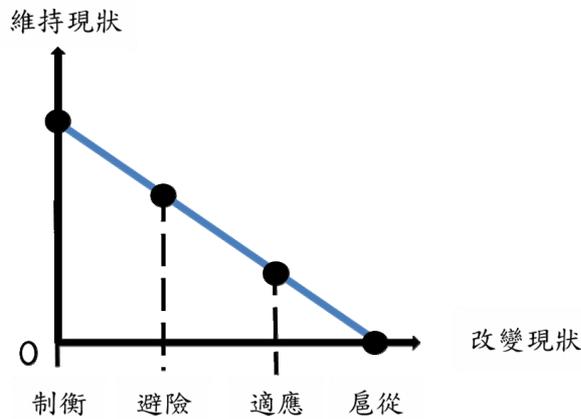


圖 2 外交政策類型之區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上半部的第一象限圖形，代表一國外交政策有不同的外交目標可組合，為避免有傾向改變現狀或維持現狀的偏見，因而將兩者皆視為正數。不同的外交政策則在圖中的斜線中分布，將四種類型的座標對置於橫線上，則可發現其光譜分布。故本文雖然無法量化外交政策的內涵，但藉由該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內容不同，可發現彼此的相對位置。

陸、結 論

現實主義典範面臨建構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等挑戰，使得新古典現實主義成為現實主義典範回應挑戰與進行對話的方向。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目前仍缺乏理論化的系統研究，大部分的研究內容，仍著重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外交政策，而中介變項上亦缺乏統一的研究模式。因此本文嘗試以決策者的衡量作為研究外交政策類型的主軸，希冀能對當前困境提供思考方向。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在事實上已有逐漸整合的跡

象，但仍需學者們的繼續研究，方能使其漸趨成熟。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正常演化

本文力圖闡述，走向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內層次，並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方向，而是必須著重介於體系與單位間的國內政治因素與理念因素，才能避免新古典現實主義由國際政治理論轉化為特定國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退化過程。古典現實主義的影響並非研究方式，而是啓發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的研究。承接上述，國家就如同撞球台上的球，但每顆球的方向與動能皆不盡相同。然而，不論每顆球之間如何移動與碰撞，仍須受到撞球台的限制，而不同的檯面與球體形狀皆會影響每顆球之間的關係。

從此角度來看，新古典現實主義仍承認國際體系的限制，也接受國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但最直接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仍是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評估。學者拉斯本也強調，國際體系雖然提供給國家自助（self-help）的誘因，但決策者的評估卻常因國內政治因素的介入，而產出不同於權力平衡的外交政策。^②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只解釋體系現實主義中的異例，同時也能繼承後者的優點，強化理論的描述力，使理論更貼近現實的外交政策。

二、決策者評估是中介變項

學者羅斯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其實有三個重要的中介的變項，除卻決策者評估的理念因素外，尚有國內政治結構對於國家能力的影響，以及政府運作資源的能力。^③然而羅斯可能不認為一個好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需要結合三個中介變項，他所闡述的僅是目前研究方向的種類。事實上，如果要結合三種中介變項，不但弱化了不同中介變項的影響，也可能忽略體系因素才是主要的自變項，使研究範疇漸趨複雜，甚至可能進入建構學派的研究途徑。

本文則選擇決策者的評估作為主要的中介變項，因為此一評估不僅包括對國際體系與趨勢的知覺（perception），也涵蓋對國內政治與國家能力的評估（calculation），因此能間接結合其他兩種中介變項，並兼顧理論的簡潔性。決策者評估雖然是理念因素的一種，亦有可能存在物質性的評估。以現實主義的基本思維觀之，決策者對於國家利益的評估，雖然會隨著時間空間而有所變化，但仍以物質利益為衡量基礎核心，且無涉於道德等價值觀。因此，本文並不主張取代政府能力因素與國內政治結構，而是認為決策者在實際上必須評估前兩者帶來的影響，同時理性評估決策背後的成本與效益。

從邏輯上觀察，國內政治不論如何紛擾，最終仍須決策核心下定奪。因此在研究

註②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p. 304.

註③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pp. 144~172.

中，應該討論的是決策者如何衡量總體情勢並相對做出回應，而非個別因素的變化對決策者的影響。如同拉斯本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看法，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是國關理論的共同財產，關鍵在於研究者如何使用，而非受這些因素所牽制。故本文採取決策者評估作為主要的中介變項，並將認知結果化約為維持現狀與改變現狀，以此導出外交政策的四種類型，用意就在於提出一種整合的研究模式，希冀能對理論研究提出些許的貢獻。

三、外交政策仍需實證研究

本文根據決策者對國內外壓力的評估，分別以維持現狀與改變現狀的不同認知，組織成四種不同的外交政策類型。區分類型可提供外交政策研究一種光譜的概念，若將制衡與扈從視為光譜的兩端，則避險與適應就處於兩端的中段。避險原則上是維持現狀，因而靠近制衡政策；適應在原則上則是改變現狀，故靠近扈從政策。這四種外交政策類型無法代表所有的類型，但可增進理解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評估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同時有助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概念延伸，望能使該理論不僅只停留在概念上的爭辯，更能描述與解釋現實政策。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下一階段的理論研究，應可繼續結合實證案例的應證。好的理論不僅要在概念上具有說服力，同時也要具備描述能力。新古典現實主義目前雖有眾多的研究成果，但在外交政策的產出上，卻無法脫離個案研究的限制。未來若能根據外交政策類型，輔以實證研究，或許能更深入的了解體系因素對不同政策的影響為何，也能使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更趨完備。

* * *

(收件：2012年5月21日，接受：2013年6月17日)

The Re-linkage betwee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Shun-Yo Liao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ng-Po Ts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Japa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evaluating factors and variables at the domestic level. Instead, the manner of which states assess threats and choose types of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based on empirical methods. The authors explain that neoclassical realism is not a result of solving anomaly but that it combines non-structural and ideational factors into the logic of the system theory. Factors at the domestic level are supposed to be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ed and simplified by types of reactions among decision makers under various pressures.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decision makers toward external pressure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lcul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of foreign policy among states: balancing, bandwagoning,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Focusing on the types rather than specific content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will continue to be a progressive research approach, while avoids becoming degenerative.

Keywor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yp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ers' assessment, progressive research approach, intervening variable

參考文獻

- Glenn Palmer and T. Clifton Morgan 著，梁書寧譯，*外交政策理論分析*（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2006年）。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差異與方法論多元」，*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3期（2009年9月），頁63~95。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15~140。
- 廖舜右，「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9期（2006年9月），頁31~48。
-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 1991).
- Kang, David C.,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itchen, Nicholas,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0), pp. 117~143.
- Kuik Cheng Chwee, "The Essential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 Legro, Jeffery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15~55.
- Lobell, Steven E., "Threat Assessment,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5~46.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 Rathbun, Bria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 294~321.
- Rose, Gide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 Sterling-Folker, Jennif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25.
- Schweller, Randall L.,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
- Schweller, Randall 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 Taliaferro, Jeffrey W.,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p. 464~495.
- Walt, Stev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alt, Stev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1985), pp. 3~43.
- Waltz, Kenneth 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4~57.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79).
- Zakaria, Fareed,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 177~198.
-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